

吳玉章講授

中國歷史教學法論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國歷史教程緒論

· 吳玉章講授 ·

新華書店發行

中國政法大學
圖書館

分類號 400

登記號 3101

幾點聲明

一、這篇中國歷史教程緒論，是我在一九三六年前後、抗日戰爭還未開始的時代寫的。當時，正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由東北而熱河，由熱河而平津，蠶食鯨吞，中國有滅亡的危險；正是賣國賊蔣介石、汪精衛等不抵抗日寇，反而三番五次地大舉進行『剿共』戰爭，並以復古，尊孔、讀經等反動教育來愚弄人民；正是文丐，和歷史曲解家不惜歪曲歷史來為蔣汪等『不抵抗主義』作辯護。如丁文江以列寧主張簽訂『布勒斯特』條約來為賣國賊作護符。某白話文歷史家竟把岳飛和秦檜顛倒過來，說秦檜是深謀遠慮的愛國策士，岳飛為暴徒亂黨。在這樣一個環境和時代中，為了激發同胞的愛國精神，不能不發揚民族愛國思想，痛罵日本帝國主義及賣國賊。喚起各階層團結一致，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來救亡圖存。現在時局有了很大的發展，形勢有了巨

大的變化。但是日本帝國主義雖已被打敗，賣國賊蔣介石等的反動政府雖已被人民解放軍打倒，而美國帝國主義還將援助蔣介石及其他反動勢力，企圖捲土重來，因此把日本帝國主義改為美國帝國主義，其餘有些地方加以適當修改，仍然是適用的。

二、我們研究歷史的方法，必須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來研究，才是唯一正確的方
法，故文中特別把『聯共黨史』內關於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部分引來，並加以
中國的歷史事實來證明，特別把中國最近十五年來兩大革命戰爭——抗日民
族革命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活生生的驚天動地的事實來證明新的社會思
想和理論，能動員民衆、組織民衆的偉大力量，並證明馬克思所說：『理論
一掌握了羣衆，便立刻成爲物質的力量』的真理。這種新的社會思想和理
論，是從我們共產黨，毛澤東同志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
的具體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產生出來。它是唯物的，不是唯心
的，不是從抽象的『人類理性原則』出發，而是從社會底具體的物質生活條

件，即社會發展底有決定作用的力量出發；不是從『偉大人物』『好人政府』底善良願望出發，而是從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底現實需要出發。

我引了一些我們黨和毛澤東同志對於時局所發表的文件，這些文件，不僅解答了抗日戰爭是誰領導；抗日戰爭誰在艱苦奮鬥；誰在陰謀妥協投降、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日本投降後這三年內戰的責任應該誰負等等問題（請參看陳伯達著「人民公敵蔣介石」）。而且也解答了中國革命爲什麼以前總是着着失敗，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就着着勝利問題。如果能從這裏使我們相信馬列主義的人更加強爲革命奮鬥的自信心，使不相信馬列主義甚至反對馬列主義的人鑑於革命成功失敗的歷史教訓，深自警惕，改造自己的思想，猛回頭來，改變自己的行動，不致走向泥潭深處而不能自拔，則我這本小冊子總算沒有白費力氣。

三、文中引用章太炎的文章數段，其文字很艱澀費解，讀者並不歡迎，主張刪去。只因他說：一個民族必須熟習其自己的歷史，才能有民族的自尊心和奮

鬥的自信心，才不爲他族所滅亡。語甚沈痛，故還是保留它。

四、因爲華北大學要把這個緒論作爲學生學習歷史的參考材料，及『人民日報』要求發表，急於付印，我沒有時間來把許多不合時宜的地方加以修改，讀者如發現有不妥當或錯誤的地方，請不吝教誨，加以指正。

吳玉章

一九四九年五月

目錄

幾點聲明

- 一 研究中國歷史的意義……………一
- 二 研究中國歷史的方法……………一五
- 三 研究中國歷史應選擇的材料……………八四
- 四 中國歷史的範圍……………九四
- 五 中國歷史的編年紀事和時代的劃分……………九五

一 研究中國歷史的意義

人類社會的歷史就是人類社會自己發展的過程。人類社會最特殊的特點，就在於人類能勞動生產。因此人類社會的歷史，應該是勞動生產者發展的歷史。

歷史是一種科學，它是要發現整個人類社會發展變化的規律的科學。尤其要研究勞動者推進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的科學。但是，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除了原始的狀態以外，都是勞動者被奴役和爭取解放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因此，現在我們研究過去的歷史，主要地是研究一定階級社會的產生、發展和衰落的科學；是研究階級鬥爭的科學。同時要研究怎樣消滅階級以達到無階級的社會的科學。

歷史科學是為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而鬥爭的有力工具。我們應該知道人類真正的歷史，勞動者被奴役和爭取解放的歷史，應該知道我們從那裏來和往那裏

去。因爲，這能十倍地堅強我們奮鬥的信心和給我們這種鬥爭勝利條件的知識。

我們常常看見，凡一個民族，如果缺乏詳實的歷史記載，則會減弱民族的自尊心和奮鬥的自信心。章太炎說：

『余數見印度人言其舊無國史，今欲搜集爲書，求雜史短書以爲之質，亦不可得，語輒扼腕。』（「國故論衡」，「原經」）

印度人所說事實是否確實，姑且不論。而章太炎深爲印度人太息沒有成文歷史的痛苦，則是有意義的。他又說：

『國之有史久遠，則亡滅之難，自秦氏以迄今茲，四夷交侵，王道中絕者數矣；然猾者不敢毀棄舊章，反正又易，藉不獲濟，而憤心時時見於行事，足以待後，故今國性不墮，民自知貴於戎狄，非「春秋」孰綱維是？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語後人，後人亦無以識前，乍被侵略，則相安於輿臺之分，詩云：「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爲流涕長潛者也。』

（同上）

他又說：

『天方薦嗟，載胥及溺，滿洲亡而復起，日人又出其雷霆萬鈞之力以濟之，諸夏阽危，不知胡底！如我學人，猶廢經史而不習，忘民族之大閑，則必淪胥以盡，終爲奴虜而已矣！』（一九三五年「講論讀經有利而無弊」）他又說：

『史之有關於國本者至大，秦滅六國，取六國之史悉焚之；朝鮮亡後，日人祕其史籍，不使韓人寓目；以今日中國情形觀之，人不悅學，史傳束閣，設天降喪亂，重罹外族入寇之禍，則不待新國教育三十年，漢祖，唐宗必已無人能知，而百年之後，炎黃裔胄，決可盡化爲異族矣！』（一九三三年，「講讀史與文化復興之關係」）

* 自孔子作『春秋』開始用編年紀事的例子，中國歷史才有可考的年代，章太炎極推崇孔子這個功績，這是他的卓見。因爲歷史必須在年代的聯系性中，敘述最重的事變和事實，才能給歷史人物以確切的評價，否則不等於小說傳奇，也只成了社會、經濟形態抽象的定義而違背唯物史觀。（著者註）

章太炎爲中國近代精通舊文學的文學家、歷史家，他深深抱着民族主義和愛國思想，就是他從舊歷史中領會得來。但是他在文字上好用古字，崇拜古文，反對白話文，泥古非今，是一個頑固守舊的人，並且他的民族思想也是一種狹隘的自居優秀民族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和我們無產階級的民族解放，民族自決思想有根本上的區別；就是他研究歷史的意義也和我們大有不同：他是要人們不要忘了漢祖唐宗的所謂『文事武功』，自己是一個『征服者』的民族，『光榮』史蹟；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則是要發現中國社會發展規律，加強人民革命勝利信心和吸取歷史經驗。在中國辛亥（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他的排滿思想起了一些宣傳革命的作用，但辛亥革命在武昌初步勝利時，他就大倡『革命軍起，革命黨消』的謬論，情願與封建軍閥反革命站在一個立場來反對孫中山，反對革命。在大革命時代，他也站在反革命方面，到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時代，他一方面贊成學生抗日革命運動，一方面卻又爲反革命蔣介石等尊孔讀經作宣傳。這因爲他是封建士大夫階級的代表，只有民族意識和愛國思想，沒有前進的革命階級立的

場。這是我們應該明白指出的，因為我們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必須分別他的言論與行動。那些是與人民利益相合，那些是與人民利益相反，指出他的功罪，而不能盲目信從，或一概抹煞。我們接受一切歷史的遺產都應該有批判的態度。我上面引章太炎的幾段話，只是爲了他說人類社會必須有詳實的歷史記載，後人必須知道前人如何發展與奮鬥的事蹟，才不至遺忘了人類發展的寶貴經驗，才不至割斷歷史，只是在這一點意義上，才把他寫在這上面。

現在我們處在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的時代，痛心於我神州古國的勞動民衆，沉淪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海中，認識了馬克思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大聲疾呼，使酣睡的牡獅，猛然驚起，跳躍於世界大革命的潮流中。有些革命家，薰染了十八世紀法國的革命思想，不承認一切的權威和過去歷史上所認爲神聖的東西：一切舊的宗教、哲學、世界觀與人生觀、社會與國家的制度等等，都要受到無情的批評；一切都要在理智面前裁決，凡是不能證實它的理性的東西，都被宣告消滅。這種懷疑的態度和革命的精神，是非常可貴的。但是，把一

切舊的社會與國家形式，一切傳統概念，都認為不合理性的，當作陳舊廢物而拋棄，認為凡在現時以前的世界，都為一些偏見所指示，因而一切它的過去只值得嘆息而輕蔑，它的歷史不值得一顧。這樣就不僅抹煞了勞動人民的發展進化歷史所創造的文明，割斷了歷史，必然要走到空想的社會主義，而且恰好給反動勢力和法西斯蒂留下一個有力的武器，使他們能夠利用特殊的民族心理來欺騙民衆。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報告『法西斯主義的進攻與共產國際為工人階級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鬥爭的任務』說：

『法西斯蒂曲解每個民族的整個歷史，以便把自己形容成爲這個民族史上一切高尚英勇事蹟的繼承者，而對於一切有傷民族觀念的恥辱事實都利用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仇敵。在德國出版幾百種書籍，其唯一的目的，就是按照法西斯主義的精神來假造德國民族的歷史。初出茅廬的民族社會黨的歷史家拚命假造德國歷史，把德國歷史弄成這個樣子……好像由於什麼「歷史的規律」，在兩千年來，都有一條發展線索貫串着，結果就有一個民族「救

「主」出現於歷史舞台，這就是日耳曼民族的「救星」，祖籍奧國人，有名的「下士」！在這些書籍裏，把日耳曼民族史上最偉大的人物，描寫爲法西斯蒂，而把偉大的農民運動，描寫爲法西斯蒂的嫡祖。

『墨索里尼拚命利用民族英雄加里波的英勇模範，來賺取政治資本。法國的法西斯蒂把女傑冉·達爾克奉爲自己的英雄。美國法西斯蒂藉口美國獨立戰爭的傳統，華盛頓、林肯的傳統。保加利亞的法西斯蒂利用七十年代的民族解放運動，及其光榮的民族英雄——列夫斯基、加拉查等人的聲譽。』

『有些共產黨員認爲所有這些事情都是與工人階級的事業沒有關係，寧願袖手旁觀，却不拿正確的歷史眼光，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列寧的、列寧斯大林的精神，來在勞動羣衆面前，說明他們本民族的歷史，却不把共產黨員目前的鬥爭與該民族過去的革命傳統聯系起來；這樣就等於自願地把民族史上的一切寶貴事蹟，奉送給法西斯蒂的歷史曲解家，讓他們愚弄民衆。』（「論統一戰線」一五六——一五八頁）

中國現在的情形，也正和季米特洛夫所說的一樣，反革命的歷史曲解家，正在玩弄復古和尊孔的把戲，曲解歷史的事實來欺騙民衆。什麼復古運動，讀經運動，鬧得烏煙瘴氣。蘇俄布勒斯特條約的事件，可以藉作賣國的護符；賣國的秦檜，可以變爲深謀遠慮的「愛國」策士。這些歷史曲解家不惜曲解事實，顛倒是非，以阿諛當世的反動統治者。不久以前，即日本未投降以前，特別鮮明的例子，就是日本的軍閥法西斯蒂，在他已佔領的中國各地，一方面大倡孔子王道等教條，表示他是中國和東方文明的保護者；一方面在學校裏強迫人人學日語，不許中國人讀中國歷史，企圖消滅中國的民族性。我們如果輕視反動勢力和法西斯蒂的這種騙人手腕，那就是罪惡。我們共產黨員是國際主義者，毫不調和地根本反對各色各樣的資產階級的民族侵略主義，可是，我們並不是民族虛無主義者。如果誰認爲，因爲要用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來教育工人和一切勞動者，他就錯，而且甚至於不得不唾棄廣大勞動民衆的一切民族觀念，那麼，他就大錯而特錯，他就毫不懂得列寧和斯大林關於民族問題的學說。

列寧說：

『難道我們這些大俄民族的覺悟工人，沒有民族自誇心嗎？當然有！我們愛自己的語言，愛自己的祖國，我們所最努力工作的，就是要教育我們祖國的勞動羣衆（即祖國十分之九的人民）使他們成爲覺悟的民主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我們所最目擊心傷的，就是暴虐無道的皇家劊子手、貴族和資本家，公然摧殘壓迫和侮辱我們的大好河山的祖國。我們引爲自誇的，就是這種壓迫政策，已經引起我們大俄人民的反抗，我們大俄人民已經推擁出拉吉雪夫、十二月黨人、七十年代的平民革命家；我們大俄民族的工人階級已經在一九〇五年造成強有力的羣衆的革命黨……我們充滿着民族自誇心，因爲大俄民族也造成了革命的階級，也證明了：大俄民族能够給人類標榜爲自由爲社會主義而鬥爭的偉大模範，而不只是大批被蹂躪被壓迫的民衆，大開刑場監獄，大開飢荒以及在神父、皇帝、地主和資本家面前大顯卑躬屈節的醜態。』

『我們充滿着民族自誇心，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特別憤恨自己的以往的奴隸生活……以及現在的奴隸狀況。現在的時候，又是那般地主、協定資本家、強迫我們東征西剿，去撲滅波蘭和烏克蘭，鎮壓波斯和中國的主運動，使羅曼諾夫、包白林斯基、普利史克維赤這般玷污我們大俄民族名聲的狐羣狗黨，更能作威作福。』（「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八十一頁，「大俄羅斯人底民族自誇心」）

我們中國有五千年的歷史，其幅員的廣大，僅次於蘇聯；超過全歐各國面積的總和；而其人口的衆多，則爲任何國家所不及，總數約在四萬萬七千萬以上。歷代以來，有不少偉大的思想家、卓絕的軍事家及出色的發明家，有異常豐富的典籍文藝；實爲東亞文化的中心基礎，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工業。

遠在三千年以前，中國已有了指南針的發明，而火藥的應用，亦遠在歐洲人以前。在一千七百年前，即有紙張的出現；在一千二百年前，已有刻版印刷的發明；在八百年前則更有活字印刷術的使用。其他各種華美精緻的金屬品、陶瓷器

及光澤美觀經久的染料，亦爲中國自古著名的特產。而愛國熱忱及勤苦耐勞的精神，尤爲中華民族向來的特色。因此，中國人民有很強的民族自誇心。例如：當『九·一八』日本佔領滿洲的時候，東三省三千多萬人民及全中國人民無不憤恨日本軍閥之欺凌我大中華民國，莫不思起而反抗；就是在蘇聯遠東的中國工人，一聽到日本佔領滿洲的消息都說道：『小日本子何敢佔我大國的土地』，平素也常常以大國人自居，充滿着民族自誇心。正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東北的游擊運動和中國工農紅軍的革命戰爭及抗日戰爭，尤其是現在進行着的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創造出最光榮的歷史。他們能够發揚光大中華民族過去迭次推翻外族壓迫統治的革命傳統。我們大中華人民，已經推擁出洪秀全、孫中山及二十世紀初的平民革命家，創造了中華民國，我們大中華民族的工人階級，已經在最近二十八年來，造成强有力的羣衆性的中國共產黨，並鍛鍊出了自己的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傑出的人民革命領袖毛澤東同志。我們充滿着民族自誇心，因爲大中華民族，也造成了革命階級，也證明了，中華民族能够給人類標榜爲自由爲獨立和爲社會

革命而鬥爭的偉大模範，而不是如日本人所罵的：『中國人無愛國心』；『中國人沒有五分鐘的熱心』；『中國人如一盤散沙』；『中國只是一塊需要強國來佔領的「無組織的領土」，中國不能算是一個國家』等等胡說。自然，我們不應該受歷史曲解家和帝國主義漢奸走狗的欺騙。他們說：『中國曾經幾次被外族征服過，如蒙古人、滿洲人都曾經征服過中國，統治了幾百年，而終竟還是被漢族征服了，因此，現在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是不怕的。』他們企圖這樣來安慰我們，以消滅我們救亡圖存的民族愛國心，以掩飾他們不抵抗求妥協和投降賣國的罪惡。我們應該知道蒙古民族和滿洲民族與漢族的鬥爭，畢竟還是國內民族的鬥爭，和帝國主義的侵略，其性質已大不同，即使勉強用來比擬，我們也要好好地懂得下面兩個條件：第一，我們有勝利的民族解放鬥爭的光榮歷史，這不僅可以自誇，而且可以十分堅強我們勝利的自信心，這是很可寶貴的，但這個光榮歷史是由艱苦鬥爭中得來，是由無數的有氣節的民族英雄的熱血換來，絕不是卑躬屈節、任人宰割、甘作亡國奴的人所能僥倖得到的。這只須一讀岳飛的『滿江

紅』，文天祥的『正氣歌』，鄭所南的『心史』，太平天國討滿清檄文，及其他許許多多慷慨激昂的文字，和無數成仁取義民族英雄之事蹟，就可以知道；第二，被征服的漢族能推翻征服者的蒙古人和滿洲人的統治，最主要的是由於以前漢族的經濟發展高於蒙古族和滿族，因而漢族在經濟上使它們不能不同化或降服，結果也就易於征服他們。至於現在的帝國主義，它已經走到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經濟和一切技術都大大的高過我們。如果坐令帝國主義現在滅亡中國，絕不會像從前蒙古人滿洲人一樣，很容易的就把他們打倒了。我們只要看朝鮮、印度等殖民地，是怎樣地受帝國主義的蹂躪和民族解放運動的難於勝利，就不能不驚醒了。

我們充滿着民族自誇心，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特別憤恨自己的已往的奴隸生活以及現在的奴隸狀況。尤其使人痛恨的是帝國主義以華制華的毒計，多方挑撥援助我國反動勢力，使之進行連續不斷的軍閥戰爭和進攻人民革命的戰爭，以便他坐收漁人之利，以滅亡中國。

現在我們大中華民族正處在最陰毒的帝國主義多方滅亡我國和我們極力爭取解放的生死鬥爭關頭，只有深刻的研究我們的歷史，喚起全民族的愛國精神，團結一致，結成牢不可破的鋼鐵一般的民族統一戰線，來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最迫切地是打倒賣國賊蔣介石和援助蔣介石等封建官僚買辦反革命集團進行內戰的美國帝國主義，我們的民族革命和社會革命才能得到勝利。

我們研究歷史更重要的意義尤在於發現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特別是發現我們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以加強我們人民爭取解放的革命必然獲得勝利的信心，和吸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使革命不犯錯誤，以加強革命的力量，循着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向前邁進。要怎樣才能發現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呢？那就必須要有正確的思想方法，就是說要瞭解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下面我就講研究歷史的方法。

二 研究中國歷史的方法

我們認為：只有用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來研究中國歷史才是唯一正確的立場與方法。

『什麼是辯證唯物主義呢？

什麼是歷史唯物主義呢？

辯證唯物主義是馬列主義黨底世界觀。其所以叫作辯證唯物主義，是因為它對自然界現象的看法，它研究自然界現象的方法，它認識這些現象的方法，是辯證的，而它對自然界現象的解釋，它對自然界現象的瞭解，它的理論，是唯物主義的。

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把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應用於社會生活現象，應用於研究社會，應用於研究社會歷史。』

（「聯共黨史」，一三三頁，一九四八年莫斯科版）

『辯證法是導源於希臘文 *dialego* 一字，其含義就是進行談話，進行論戰。古代人所謂辯證法，就是以揭露對方議論中的矛盾並克服這些矛盾來求得真理的方術。』（同上，一三四頁）

『辯證法是與形而上學根本相反的。』（同上，一三四頁）

I. 辯證法認為：

『既然世界上沒有孤立的現象，既然所有一切現象都是彼此關聯，互相制約，那末在估計歷史上每一個社會制度和每一個社會運動時，當然也就不可如歷史家常作的那樣從「永恆正義」或其他某種成見出發，而是要從這個制度和這個社會運動所由產生並與其相聯結的那些條件出發。』（同上，一三九頁）

因此，孟子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的天命論，『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論，以及所謂『正統偏安』，『大義名分』等等永遠不變的

善惡的概念，絕對無條件的倫常觀念的「永恆正義」的學說，都不合乎科學。

『奴隸制度，就現代的條件來看，是很荒謬的現象，反常的荒誕事情。而奴隸制度在瓦解着的原始公社制度條件下，却是完全可以瞭解並且合於規律的現象，因為它和原始公社制度相比是前進一步。』

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在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社會存在的條件下，譬如說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國，是完全可以瞭解的一種正確的和革命的要求，因為資產階級共和國在當時是前進一步。而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就我們蘇聯現時的條件來看，却是一種荒謬的和反革命的要求，因為資產階級共和國與蘇維埃共和國相比是後退一步。』（同上，一三九頁）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條件下的中國，在過去——在『五四』運動以前，獨立、自由、平等的民主共和國的要求是完全可以瞭解的、正確的與革命的要求，但是，在現在——在世界上資本主義共和國已經過時了，腐化了，而有了最新式的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現在，在中國也就不是要實現舊式的資本主義的民主共和

國，而是要實現新民主主義共和國。

毛澤東同志說：

『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党的新三民主義共和國。這種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一方面與舊形式的、歐美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這是舊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種共和國已經過時了。另一方面，也與最新式的、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共和國相區別，這是最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種共和國已經在蘇聯興盛起來，並且還要在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來，無疑將成爲一切先進國家的國家構成與政權構成的統治形式。但是這種共和國，在一定的歷史時期中，還不適用於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中。因此，在一切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國家形式，唯一的只能是第三種形式，這就是所謂新民主主義共和國。這是一定歷史時期的形式，因而是

過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

『一切都依條件，地方和時間為轉移。』

顯然，沒有這種觀察社會現象的歷史觀點，那歷史科學就會無法存在和發展，因為只有這樣的觀點才能使歷史科學不致變成一筆偶然現象的糊塗賬，不致變成一堆荒謬絕倫的錯誤。」（「聯共黨史」，一三九頁）

II 辯證法認為：

『既然世界是處在不斷運動和不斷發展中，既然舊東西衰亡和新東西生長是發展底規律，那末當然也就沒有什麼「永世不移的」社會秩序，什麼私有制和剝削制的「永恆原則」，什麼農民服從地主，工人服從資本家的「永恆觀念」。』（同上，一三九到一四〇頁）

這就是說：

『資本主義制度可以用社會主義制度來替代，正如資本主義制度在當時替代了封建制度一樣。』（同上，一四〇頁）

III 辯證法認為：

『最重要的不是現時似乎堅固，但已經開始衰亡的東西，而是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那怕它現時似乎還不堅固，因為在辯證法看來，只有正在產生，正在發展的東西，才是不可戰勝的。』（同上，一三五頁）

這就是說：

『不是要指靠社會裏已經不再發展的階層，那怕這些階層在現時還是佔優勢的力量，而是要指靠社會裏正在發展，具有遠大前途的階層，那怕這些階層在現時還不是佔優勢的力量。』

在第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當馬克思主義者和民粹派鬥爭的時候，俄國無產階級與當時佔居民絕大多數的個體農民比較起來，還是佔很小的少數。但當時無產階級是個發展着的階級，而農民却是個日趨瓦解的階級。正因為無產階級是個發展着的階級，所以馬克思主義者也就指靠着無產階級。而且他們並沒有弄錯，因為大家知道，無產階級後來已由一個不大的力量發展成了

歷史上和政治上的頭等力量。』(同上，一四〇頁)

中國的無產階級，近三四十年來，從很小的力量生長為革命中巨大的歷史的與政治的力量，這是為人人所公認的事實，有些歷史家只看見過時的、腐化的、正在衰亡的社會現象的一方面，而就以為『世道衰微』、『人心不古』、『江河日下』、『世界末日』等等所謂世界退化是必然的。因而『是古非今』大倡其復古讀經等謬論，這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極糊塗的思想。

這就是說：

『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後看。』(同上)

IV 辯證法認為：

『既然由緩慢的數變進到迅速的突然的質變是發展底規律，那末由被壓迫階級所實行的革命的變革，當然也就是完全自然而必不可免的現象。』

(同上)

這就是說：從封建或半封建社會到更進步社會的轉變和被壓迫民族從帝國主

義壓迫下的解放，也同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和工人階級從資本主義的壓迫下的解放一樣，決不能經過緩慢的變化，決不能經過改良的道路來完成的，祇能經過封建主義制度或資本主義制度之質的變化，經過革命的道路來完成。

中國近五十年的革命運動之所以未能使中國脫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除了其他重大的原因外，最重要的就是受了改良妥協派的戕害，使革命不能澈底，使中國社會不能起質的變化而得到解放和進步。

這就是說：

『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便要做革命家，而不要做改良主義者。』
(同上)

V 辯證法認爲：

『既然發展過程是經過內在矛盾底揭露，是經過基於這些矛盾的彼此對立勢力衝突來克服這些矛盾而進行的，那末無產階級底階級鬥爭，當然也就是完全自然而必不可免的現象。』(同上，一四〇到一四一頁)

這就是說：不應該掩飾階級社會的矛盾，而應該揭發與暴露這些矛盾，不應該湮沒階級鬥爭，而應該把它貫徹到底。

在中國近五十年革命的經驗教訓中，有兩個失敗的例子和一個成功的例子，可以證明這個真理。

第一個失敗的例子是，一八九八年改良主義的戊戌變法失敗以後，革命派與康梁保皇立憲的妥協派進行鬥爭，一九〇五年孫中山聯合各革命黨派組成革命同盟會，提出了革命的三大綱領，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雖然它是舊式的，一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沒有認識到帝國主義剝強是中國最大的敵人，反而想利用它來幫助中國革命，是很錯誤的。但還是團結了廣大的革命力量，並與改良主義和妥協派作了不調和的鬥爭。因此獲得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的勝利。推翻了滿清及中國數千年的專制制度，建立了民主共和國。不幸，革命的南京政府剛一成立，汪精衛等妥協派就力主南北議和。不把革命鬥爭貫徹到底，孫中山雖不贊成妥協政策，但沒有堅持，反而把剛成立的革命政權交給反革

命的官僚、北洋軍閥袁世凱，並向參議院推荐袁世凱作總統，這就失掉了革命的階級立場，使革命失敗了，流產了。

第二個失敗的例子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代，中國革命的事實已經證明，舊式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已經過時了，不能解決中國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革命問題，而新式的、特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潮流，則在中國發展起來。這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形成的。因為在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社會主義的國家，這就使整個世界起了一個大變化。改變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方向。劃分了整個世界歷史的時代。中國在這一次世界大戰的時期，因為歐洲各帝國主義陷於戰爭漩渦，對於中國的壓力減輕了，中國資本主義有了飛躍的發展，而中國革命失敗後，軍閥混戰的局面，使得民不聊生，這就使新興的革命階級——無產階級，不得不找尋新的出路，正在這個時候，十月革命的勝利和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來了，新時代的新思潮就應時而生。『五四』新文化運

動，不僅是表面的提倡白話文的文學革命、打倒孔家店的思想革命，而且是新的社會思想、新的政治觀點、新的革命理論、新的政治制度的反映。乃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產生的標誌。一九二一年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成立，打出了正確的、鮮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幟，這才把中國革命的對象認清楚了。孫中山認識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新血液，生力軍，願和共產黨合作來改組陳腐的國民黨，並重新解釋他的三民主義，提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來完成他的革命的三民主義。一九二四年國共合作以後，中國革命的潮流更向前高漲，並與反對派、妥協派作了不調和的鬥爭，獲得了一九二六——二七年北伐戰爭的勝利。不幸，正當革命將在全國勝利的時候，鑽進國民黨的投機分子蔣介石背叛革命與帝國主義勾結，在上海殘殺工人及共產黨人，在南京成立反革命的政府。但武漢革命政府仍堅決戰鬥，成了革命的中心，革命更深入農村，土地革命蓬勃發展起來，革命營壘中的妥協投機分子汪精衛等又驚慌了，大叫農民運動過火了。當時中共中央機會主義、投降主義的領導者陳獨秀也跟着大叫農民

運動過火了。不僅不讓革命鬥爭貫徹到底，反而與反革命妥協，反對土地革命，讓反革命去鎮壓工農運動。但陳獨秀這種怕資產階級離開革命的投降妥協政策，還是不能阻止汪精衛也隨蔣介石之後背叛革命，大殺工農及共產黨人，革命又遭到失敗了。

以上是兩個革命失敗的例子，下面再講一個革命成功的例子。

這一個成功的例子是，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九·一八』事變，繼續佔領中國東北各省以至於平、津。國民黨蔣介石等反動政府，以不抵抗主義坐視國土的不斷喪失，反而專事『剿共』戰爭，壓迫全國的抗日愛國運動，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革命黨派和廣大人民團結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之作了長期的、不調和的鬭爭，終於迫使蔣介石不能不接受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要求。於一九三七年，開始了『七七』的抗日戰爭。雖然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陰謀同日寇妥協投降，由於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全國愛國民衆，堅持抗戰到底，反對妥協投降，使蔣介石不敢繼汪逆精衛之後投

降日本，終於使抗日戰爭贏得了完全的勝利，使日寇投降。這是把鬪爭貫徹到底而獲得成功的第一個好例子。

這就是說：要在政治上不犯錯誤，那麼，就要實行不調和的革命階級的革命政策，而不要實行階級利益協調的改良主義政策，而不要實行資本主義『成長』成爲社會主義的妥協政策。更不要實行與敵國妥協求和，苟且偷安的自殺的亡國滅種政策。

這就是應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到社會生活上、到社會歷史上的情形。
至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唯物論，那他根本地和哲學的唯心論是直接相反的。

『不言而喻，把哲學唯物主義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該有如何巨大的意義；把這些原理應用到社會歷史上，應用到無產階級黨底實際活動上去，該有如何巨大的意義。』（「聯共黨史」，一四五頁）

I. 唯物論認爲：

『既然自然界中各現象底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是自然界發展底規律，那末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生活中各現象底相互聯系和相互制約也同樣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社會發展底規律。』

由此可見，社會生活，社會歷史，已不復是一堆「偶然現象」，因為社會歷史已成爲社會底規律性的發展，而社會歷史底研究已成爲一種科學。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底實際活動決不應以「卓越人物」底善良願望爲基礎，決不應以「理性」、「普遍道德」等等底要求爲基礎，而應以社會發展底規律爲基礎。應以研究這些規律爲基礎。」（同上）

中國有些歷史家認爲歷史是英雄創造的，所謂『英雄造時勢』。抱這樣一類觀點的人，往往把人民當奴隸去看待。因而他們不能不走向輕視人民的力量，侮辱人民，說人民是一般無知的羣氓，要等待英雄去把他們變成人民。如尙書說：『黎民於變時雍，』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又有些歷史家以唯心論的觀點說，心理可以創造一切，英雄可以創造時勢，如梁啓超說：

「史界因果之劈頭一大問題，則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換言之，則所謂「歷史爲少數偉大人物之產兒」「英雄傳卽歷史」者，其說然耶否耶？羅素言：「一部世界史試將其中十餘人抽去，恐局面或將全變。」此論吾儕不能不認爲確含一部分真理，……吾以爲歷史之一大祕密，乃在一個人之個性，何以能擴充爲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與夫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何以能寄現於一個人之個性？申言之：則有所謂民族心理與社會心理者，其物實爲個人心理之擴大化合品，而復寄個人之行動以爲之表現。……由人類心理之本身，有突變之可能性。心理之變動，極自由不可方物。無論若何固定之社會殊不能預料或限制其中之任何事任何人忽然起一奇異之感想；此感想一度爆發，視其心力之強度如何，可以蔓延及於全社會。」（梁啓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一七〇——一七四頁）

馬克思主義者則認爲：

「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而是歷史創造英雄，也就是說，不是英雄創造人

民，而是人民創造英雄並推進歷史。英雄，傑出人物，只有當他們能正確瞭解社會發展條件，瞭解應如何改進這些條件的時候，才能在社會生活中起重大的作用。英雄和傑出人物如果不能正確瞭解社會底發展條件，却竟不顧社會底歷史要求而胡作亂爲，儼然以歷史底「創造者」自居，那他們就會變成滑稽可笑，一錢不值的倒運人物。」（「聯共黨史」，二七頁）

II. 唯物論認爲：

『既然世界可能認識，既然我們關於自然界發展規律的知識是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確實知識，那末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生活，社會發展也同樣可能認識，科學方面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材料是具有客觀真理意義的確實材料。』

由此可見，社會歷史科學，不管社會生活中的現象怎樣複雜，都能成爲例如生物學一樣的準確科學，能利用社會發展規律來供實際的應用。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在其實際活動中，決不應以什麼偶然動機爲準

則，而應以社會發展規律，以及由這些規律中所得出的實際結論爲準則。

由此可見，社會主義已由關於人類美滿未來的空想變成了科學。

由此可見，科學和實際活動間的聯系，理論和實踐間的聯系，它們的一致，應當成爲無產階級黨底南針。』（同上，一四五到一四六頁）

中國舊歷史家認爲：宇宙是不可測度的，一切歸之於天命人心。聖人奉天承運，代天立極而爲天子。天下治亂繫於執政者之一心。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以及所謂執中的心傳，中庸的大道等等唯心論的觀點，都應該根本肅清，才能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社會歷史。不然則自己雖號稱以科學的方法來研究歷史而終不能了解社會發展的規律。如梁啓超說：

『歷史爲人類心力所造成，而人類心力之動，乃極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或數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則其所產生之歷史，自亦與之一性質，今必強懸此律以馭歷史，其道將有時而窮，故曰不可能，不可能而強應用之，將反失歷史之真相，故曰有害也。』（「中國歷史研究法」，一

雖然梁啟超也注重物質環境，而始終不能脫離唯心論的觀點，故他不能說明真正的歷史。

III. 唯物論認為：

『既然自然界，存在，物質世界是第一性的現象，而意識，思維是第二性的現象，從生的現象；既然物質世界是不依賴於人們意識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意識是這客觀現實底反映，那末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底物質生活，社會的存在，也是第一性的現象，而社會底精神生活是第二性的現象，從生的現象；社會底物質生活是不依賴於人們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社會底精神生活是這客觀現實底反映，存在底反映。』

由此可見，社會底精神生活所由形成的來源，社會思想，社會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所由產生的來源，並不是要到思想，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本身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會底物質生活條件中，要到社會存在中去探

求，因為這些思想，理論和觀點等等，是這社會存在底反映。

由此可見，如果我們在社會歷史各個不同的時期可以看見各種不同的社會思想，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如果我們在奴隸制度下所遇見的是一種社會思想，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在封建制度下所遇見的是另一種，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遇見的又是一種，那就不是由於什麼思想，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本身底「天性」和「屬性」，而是因為在各個不同的社會發展時期有各個不同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

社會存在怎樣，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怎樣，社會思想，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也就會怎樣。

因此馬克思說：

「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二六九頁）

由此可見，爲了在政治上不犯錯誤，爲了不致陷入空洞臆想家的地位，

那末無產階級黨在自己的活動中，就不應從抽象的「人類理性原則」出發，而應從具體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即從社會發展底決定力量出發；不應從「偉大人物」底善良願望出發，而應從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現實需要出發。

空想派——包括民粹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在內——陷於覆亡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不承認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首要作用，而陷入了唯心主義，不把自己的實際活動建築在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需要上，却不顧這種需要並違反着這種需要而把它建築在脫離社會現實生活的「理想計劃」和「包羅萬象的方案」上。」（「聯共黨史」，一四六——一四七頁）

中國歷史上歌頌的所謂『唐虞盛世』『大同世界』以孝和仁義爲『包羅萬象的方案』同空想派一樣，都是一種空想。

『馬列主義之所以強而有力和生氣勃勃，也就是因爲它在自己的實際活動中正是憑藉於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需要，無論何時也不脫離社會底現實生

活。

可是，決不應當從馬克思底話中作出結論，說社會思想，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在社會生活中沒有作用，說它們不反轉來影響到社會存在，影響到社會生活物質條件底發展。我們在這裏暫且只是說到社會思想，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底起源，只是說到它們的產生，只是說到社會精神生活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底反映。至於社會思想，理論，觀點和政治制度底意義，至於它們在歷史上的作用，那末歷史唯物主義不僅不否認，恰巧相反，正是着重指出它們在社會生活和社會歷史上的嚴重作用和意義。

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思想和理論。有舊的思想和理論，它們是已經衰頹，並為社會上那些衰頹着的勢力底利益服務的東西。它們的作用就是阻礙社會發展，阻礙社會前進。同時又有新的先進的思想和理論，它們是為社會上的先進勢力利益服務的東西。它們的作用就是促進社會發展，促進社會前進，而且它們愈是確切反映着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需要，便能獲得愈加巨大的意

義。」（「聯共黨史」，一四七——一四八頁）

中國有些歷史家認為：

『中國的文字、文學是建設了「人的文化」，同化了許多蠻族，平定了許多外患，同化了非人的文化……中國比歐洲人失敗的原因，只是少了一個大的和附帶一個小的：大的是科學，小的是工業……我們明白了這個教訓，比歐洲所缺乏的是什麼，我們的努力就有目標。』（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盛京時報」載胡適作「中國歷史的一個看法」）

胡適這種說法和張之洞一流崇古尊孔的人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理論』，都是替衰頹下去的社會勢力服務的理想和理論。

『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只有當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已在社會面前提出新的任務時，才會產生出來。可是，它們既已產生出來，便會成爲最嚴重的力量，能促進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所提出的新任務，能促進社會前進。在這裏也就表現出新的思想，新的理論，新的政治觀點和新的政治制度所具

有的那種偉大的、組織的、動員的和改造的意義。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所以產生出來，正是因為它們爲社會所必需，因為若沒有它們那種組織的、動員的和改造的工作，便無法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中已經成熟的任務。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既已在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過程所提出的那些新任務基礎上產生出來，便能掃除障礙，深入民衆意識，動員民衆，組織民衆去反對社會上衰頹着的勢力，因而使利着推翻社會上正在衰頹而阻礙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勢力。』（「聯共黨史」，一四八頁）

從我們中國共產黨最近十五年的革命歷史來看，每當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到了一個新的政治形勢時，我黨就提出新的任務。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我黨即指出時局的特點說：

『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上的變化，在中國革命史上劃分了一個新時期，這表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爲殖民地，中國革命準備進入全國性的大革命，在世界是革命與戰爭的前夜。』

黨提出的任務，『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

這一反日反賣國賊的民族統一戰綫的指示，適合於當時社會發展的需要，因此就能發動全國廣大民衆，他們熱烈要求實現中國共產黨「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但蔣介石仍不願抗日，反而繼續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內戰，親自到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進攻陝北共產黨的紅軍（即現在的人民解放軍）。張楊出於義憤，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西安把蔣介石逮捕起來，這就是有名的西安雙十二事變。中國共產黨爲了團結全國一致抗日，就向張楊建議，只要蔣介石願意共同抗日，實行所提出的條件，就釋放他以加強抗日力量。蔣介石被迫表示願意停戰、共同抗日，并允實行所提條件，這才開始了一九三七年「七七」的抗日戰爭。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的英勇的八年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使日本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獲得了光榮的勝利。

但是，在八年抗日戰爭中，不是沒有各種危險的，首先就是國民黨蔣介石反

共投降的危險。因此，毛澤東同志一九三九年六月指出當時的危險說：

『目前形勢的特點在於：國民黨投降的可能已經成爲最大的危險，而其反共活動則是準備投降的步驟。國民黨投降可能是從抗戰開始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發生的；但成爲時局的最大危險，則是目前政局中的現象。國民黨反共也是從統一戰線建立時就存在的，不是今天突然發生的；但把反共作爲直接投降的步驟，則是目前的實際。』

毛澤東同志及時地指出當前的任務，他在答覆『新華日報』記者的談話中說：

『中國的前途有兩個：一個是堅持抗戰、堅持團結、堅持進步的前途，這就是復興的前途。一個是實行妥協、實行分裂、實行倒退的前途，這就是亡國的前途。』

在新的國際環境中，在日本更加困難與我國絕不妥協的條件下，我國的戰略退却階段便已完結，而戰略相持階段已到來。所謂戰略相持階段，即

是準備反攻的階段。

但是，正面相持與敵後相持是成反比例的，正面相持的可能增多，敵後相持的可能就要減少。所以，從武漢失守後開始的敵人在淪陷區（主要是在華北）舉行的大規模軍事「掃蕩」，今後不但還會繼續，而且還會加緊起來。更因敵人的主要政策是「以華制華的政治進攻」與「以戰養戰的經濟侵略」，英國的東方政策是召開遠東慕尼黑，這就加重了引誘中國投降與造成中國分裂的極大危險性。至於我國國力與敵人對比，還是相差很遠，要準備實行反攻的力量，非全國一致，艱苦奮鬥，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國抗戰的任務還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任務，千萬不要絲毫大意。因此，毫無疑義，中國萬萬不可放棄現在的時機，萬萬不可打錯主意，而應該採取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

這就是：第一，堅持抗戰立場，反對任何的妥協運動。不論是公開的汪精衛和暗藏的汪精衛，都應該給以堅決的打擊，不論是敵人的引誘和英國的

引誘，都應該給以堅決的拒絕，中國決不能參加東方慕尼黑。

第二，堅持團結立場，反對任何的分裂運動。也不論是從敵人方面來的，外國方面來的，國內投降派方面來的，都應該充分的警戒。任何不利於抗戰的內部磨擦，必須用嚴正態度加以制止。

第三，堅持進步立場，反對任何的倒退運動。不論是軍事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財政經濟方面的、黨務方面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與民衆運動方面的，一切不利於抗戰的思想、制度與辦法，都要來一個重新考慮與切實改進，以利抗戰，以慰全國喁喁之望。

果能如此，中國就能好好的準備反攻力量。

從現時起，全國應以「準備反攻」爲抗戰的總任務。」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實行了毛澤東同志這個指示，使國民黨蔣介石不敢投降，使中國轉到反攻。

一九四〇年毛澤東同志發表『新民主主義論』，他說：

『很清楚的，中國現時社會的性質，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它就決定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爲兩個步驟。第一步，改變這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形態，使之變成一個獨立的民主主義的社會。第二步，使革命向前發展，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國現時的革命，是在做第一步。』

這一有名的劃時代的論文，把中國革命的前途，中國社會發展的方向，中國革命的目的，說得清清楚楚，使人從思想上、從理論上，得到一個明確的解答，是一部空前偉大的著作。

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同志又發表『論聯合政府』，詳細說明了抗日建國的總路線。日本投降後的雙十協定、停戰協定、政治協商會議等等都是在新環境到來，就提出新任務。

以上這些都是在新形勢下提出新任務，使它變成新的思想和理論，以動員民衆、組織民衆。這些新任務是由社會底物質生活之發展而產生的，是隨時局的發

展和變化而發展和變化，其思想理論亦隨之不斷向前發展。尤其在最近三年來，時局的發展愈快，新任務的提出也愈快，每當一個新形勢的緊要關頭，毛澤東同志就很高確地、很明白地指出新的任務，充分表現出他的堅定的原則性和必需的靈活性。

一九四六年七月，爲美國帝國主義所支持的國民黨反動派，撕毀了『停戰協定』、『政協決議』，在中國發動反革命的全國規模的戰爭，中國人民和人民解放軍則在共產黨領導之下，起來反抗這種反革命戰爭，舉行了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經過一年後，軍事情況的基本特點就是人民解放軍由防禦轉入進攻，國民黨的反動軍隊則由進攻轉入防禦。同時國民黨反動統治區域，人民不堪壓榨，紛紛起來反抗，開闢了第二條戰線。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中共權威人士評目前時局的結論說：

『中國事變的發展，比人們預料的要快些。一方面是人民解放軍的勝利，一方面是蔣管區人民鬥爭的前進，其速度都是很快的。爲了實現一個和

平的、民主的、獨立的新中國，中國人民應當準備一切必要條件。」（「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標準本，華北新華書店版，四頁）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公佈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決議」，號召展開及貫徹全國的土地改革運動，完成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這是中國佔鄉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農民即三萬萬六千萬以上的人的迫切要求，這一動員的號召，使農民抬起頭來，在解放區推翻了封建制度，打破了生產關係的枷鎖，農民就活躍起來，踴躍生產和參軍，使解放軍壯大而所向無敵。

毛澤東同志於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會議提出「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報告上說：

「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現在已經達到了一個轉折點。這即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打退了美國走狗蔣介石的數百萬反動軍隊的進攻，並使自己轉入了進攻……中國人民解放軍已經在中國這一塊土地上扭轉了美國帝國主義及蔣介石匪幫的反革命車輪，使之走向覆滅的道路，推進了自己的革命車

輪，使之走向勝利的道路。這是一個歷史的轉折點。這是蔣介石二十年反革命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百多年以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由發展到消滅的轉折點。這是一個偉大的事變。這個事變所以帶着偉大性，是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一個具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國家內，這個事變一經發生，它就將必然地走向全國的勝利。這個事變所以帶着偉大性。還因為這個事變發生在世界的東方，在這裏，共有十萬萬以上人口（佔人類的一半）遭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中國人民的解放戰爭由防禦轉到進攻，不能不引起這些被壓迫民族的歡欣鼓舞。同時，對於正在鬥爭的歐洲各國的被壓迫人民，也是一種援助。」

毛澤東同志在同一報告中，又清楚地指出國內國際現時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的特點說：

「蔣介石反動集團在一九四六年發動全國規模的反人民的國內戰爭的時候，他們之所以敢於冒險，不但依靠他們自己的優勢的軍事力量，而且主要

地依靠他們認為是異常強大的、舉世無敵的、手裏拿着原子彈的美國帝國主義，一方面，能够像流水一樣地供給他們以軍事上與財政上的需要；另一方面，狂妄地設想所謂「美蘇必戰」，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爆發」。這種對於美國帝國主義的依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全世界各國反動勢力的共同特點。這件事，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予世界資本主義的打擊的嚴重性，反映了各國反動派力量的薄弱及其心理的恐慌與喪失信心，反映了全世界革命力量的強大，使得各國反動派除了依靠美國帝國主義的援助就感到毫無出路。但是，在國際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美國帝國主義，是否真如蔣介石及各國反動派所設想的那麼強大呢？是否真能像流水一樣的從美國接濟蔣介石及各國反動派呢？並不如此。美國帝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增強起來的經濟力量，遇着了不穩定的日趨縮小的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這種市場的進一步縮小，就要引起經濟危機的爆發。美國的戰爭景氣，僅僅是一時的現象。它的強大，只是表面的與暫時的。危機就像一座火

山，每天都在威脅美國帝國主義，美國帝國主義就是坐在這座火山上。這種情況，迫使美國帝國主義分子建立了奴役世界的計劃，像野獸一樣，向歐、亞兩洲及其他地方亂竄，集合各國的反動勢力，那些被人民唾棄的渣滓，組成帝國主義及反民主的陣營，反對以蘇聯爲首的一切民主勢力，準備戰爭，企圖在將來，在遙遠的時間內，有一天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打敗民主力量。這是一個狂妄的計劃。全世界民主勢力必須打敗這個計劃，也完全能够打敗它。全世界反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超過了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優勢是在我們方面，不在敵人方面。以蘇聯爲首的反帝國主義陣營，業已形成。沒有危機的、向上發展的、受到全世界廣大人民羣衆愛護的社會主義的蘇聯，它的力量，現在就已經超過了被危機嚴重威脅着的、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廣大人民羣衆反對的帝國主義的美國。歐洲各新民主國家，正在鞏固其內部，並互相團結起來。以法意爲首的歐洲各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的反帝國主義力量，正在發展。美國內部，存在着日趨強大的人民民主勢力。拉丁美洲的人

民，並不是順從美國帝國主義的奴隸。整個亞洲，興起了偉大的民族解放運動。反帝國主義陣營的一切力量，正在團結起來，並正在向前發展。歐洲九個國家的共產黨，業已組成了情報局，發表了號召全世界人民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奴役計劃的檄文。這篇檄文，振奮了全世界被壓迫人民的精神，指示了他們的鬥爭方向，鞏固了他們的勝利信心。全世界反動派，在這篇檄文面前驚慌失措。東方各國一切反帝國主義的力量，也應當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及各國內部反動派的壓迫，以東方十萬萬以上被壓迫人民獲得解放為奮鬥的目標，我們自己的命運完全應當由我們自己來掌握，我們應當在自己內部肅清一切軟弱無能的思想。一切過高估計敵人力量與過低估計人民力量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我們和全世界民主力量一道，只要大家努力，一定能夠打敗帝國主義的奴役計劃，阻止第三次世界大戰，使之不能發生，推翻一切反動派的壓迫，爭取人類永久和平的勝利。」

『只要我們能夠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信任羣衆，緊緊地和羣衆

一道，並領導他們前進，我們是完全能够超越任何障礙與戰勝任何困難的，我們的力量是無敵的。現在是全世界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走向滅亡，全世界社會主義與民主主義走向勝利的歷史時代，曙光就在前面，我們應當努力。」

一年多以來，事實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是完全正確的，我人民解放軍接連獲得無數次的偉大勝利，一九四八年十月，錦州、遼西大捷後，國民黨在東北近百萬的軍隊，全部被殲，東北已完全解放，隨卽有徐州、淮海大戰，殲滅了國民黨軍六十萬，東北人民解放軍入關，會同華北解放軍包圍平津，國民黨軍已面臨全軍覆沒的命運。美國帝國主義恐其走狗的滅亡，嗾使蔣介石於一九四九年元旦放出和平空氣，企圖以假和平獲得喘息機會，苟延生命，以便捲土重來。我黨洞燭其奸，一面號召全國人民，將革命進行到底，一面由毛澤東同志於一月十四日發表聲明說：

「雖然中國人民解放軍具有充足力量和充足理由，確有把握在不要很久

的時間之內，全部消滅反動政府的殘餘軍事力量，但是爲了迅速結束戰爭，實現真正的和平，減少人民的痛苦，中國共產黨願意與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他任何國民黨地方政府與軍事集團在下列條件的基礎之上進行和平談判。這些條件是：（一）懲辦戰爭罪犯；（二）廢除偽憲法；（三）廢除偽法統；（四）依據民主原則改編一切反動軍隊；（五）沒收官僚資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廢除賣國條約；（八）召開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接收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及其所屬各級政府的一切權力。中國共產黨認爲，上述各項條件反映了全國人民的公意，只有在上述各項條件之下所建立的和平，才是真正的民主的和平。如果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中的人們，願意實現真正的民主的和平，而不是虛僞的反動的和平，那麼，他們就應當放棄其反動的條件，承認中國共產黨提出的八個條件，以爲雙方從事和平談判的基礎。否則，就證明他們的所謂和平，不過是一個騙局。』

全國人民擁護這一聲明，解放軍打下天津後，北平二十餘萬國民黨守軍即依照解放軍的條件，由解放軍和平接收北平。至此，華北、華中、華東、中原幾已完全解放，國民黨反動政府不得已派代表到北平談判，經過了十五日的和談，作出了八條二十四項的『國內和平協定』，限於四月二十日簽字。但是國民黨反動政府拒絕簽字，解放軍於四月二十一日大舉渡江，一天即渡過一百萬大軍，三天即解放了南京，作惡了二十二年的國民黨反動政府宣告滅亡了。革命即將在全國範圍內獲得完全勝利了。

中國革命，經過了許多曲折，遭受了很多困難，特別是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的侵略暴行，已由東北而熱河，由熱河而平津，民族危機到了深重的時候，毛澤東同志重申我黨『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要求，向全國人民呼籲，得到全國人民的熱烈歡迎，發動了廣大民衆，堅持了八年的抗日戰爭，獲得了完全的勝利。但是因為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在抗日時期，政權握在反革命蔣介石的手裏，沒有能如毛澤東同志『民主的抗日』的戰略來達

到建立獨立與民主的新中國，恰恰相反，蔣介石乘抗日戰爭關係，把一切國家大權集於一身；把國家經濟『化公爲私』，成了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私產。這四大家族，在他們當權的二十二年中，已經集中了價值達一百萬萬至二百萬萬美元的鉅大資本，壟斷全國的經濟命脈。這個壟斷資本，與國家政權結合在一起，成爲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個壟斷資本主義，與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國地主階級及舊式富農，密切地結合着，成爲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又成爲美國帝國主義壟斷資本主義的附庸。他們與美國帝國主義最反動的戰爭販子結合，瘋狂地反蘇反共，企圖製造第三次世界大戰，公然要以中國爲反蘇大戰的根據地，中國人民又面臨着美國帝國主義變中國爲殖民地的嚴重時期。三年來，中國人民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又得到了偉大的勝利。

總結近十五年來的歷史，中國革命遇到幾次大的危機，終能取得勝利，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就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毛澤東同志以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

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正確地認識了中國社會底物質生活發展之需要，堅決地提出了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封建主義，打倒官僚資本主義，在全國範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由半殖民地變為真正的獨立國，使中國人民來一個大解放，將自己頭上的封建的壓迫和官僚資本（即中國的壟斷資本）的壓迫一起掀掉，並由此造成統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造成由人剝削人的社會改造為沒有人剝削人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可能性。這個新的社會思想、這個新的社會理論，是由中國社會底物質生活之發展所產生出來，適合於中國國情和人民的需要。而且在每一新環境，新形勢到來，又靈活的提出新任務，因此就能發動廣大民衆，就能動員他們並把他們組織成爲無產階級黨底偉大的軍隊，這個偉大軍隊就能完成新的革命的任務。

「因此馬克思說：

「理論一掌握了羣衆，便立刻成爲物質的力量。」（「馬恩全集」，第一卷，第四〇六頁）

由此可見，無產階級黨，爲要有可能去影響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並加速其發展，加速其改善，便應憑藉於這樣一種社會理論和社會思想，這種理論和思想能正確反映社會物質生活發展底需要，因而能發動廣大民衆，能動員他們，把他們組織成一支決意打破社會反動勢力並爲社會先進勢力開闢道路的無產階級黨的偉大軍隊。

「經濟主義者」和孟什維克陷於覆亡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不承認先進理論和先進思想有動員的、組織的和改造的作用，而陷入了庸俗唯物主義，竟把先進理論和先進思想的作用看成幾等於零，因而使黨陷於消極無爲，陷於萎靡不振的地步。

馬列主義之所以強而有力和生氣勃勃，就是因爲它憑藉於正確反映着社會物質生活發展需要的先進理論，把這個理論提到它所應有的高度，並努力

來澈底利用這個理論所有的動員的、組織的和改造的力量。

歷史唯物主義就是這樣來解決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間，社會物質生活發展條件和社會精神生活發展間互相關係問題的。

現在還要說明一個問題：從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看來，究應把歸根到底決定社會面貌，社會思想，觀點和政治制度等等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瞭解爲什麼東西呢？

這「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究竟是什麼；它們的特徵究竟怎樣呢？

首先，「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這一概念，當然是把環繞着社會的自然界，即地理環境包含在內，因爲這個環境是社會物質生活所必要的和經常的條件之一，而且無疑是影響到社會底發展。地理環境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怎樣呢？地理環境是不是決定社會面貌，人們社會制度性質，以及由一個制度過渡到另一個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歷史唯物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是否定的。

地理環境當然是社會發展底經常必要的條件之一，而且它無疑是能影響到社會底發展，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進程。但它的影響並不是決定的影響，因為社會底變更和發展要比地理環境底變更和發展快得不可計量。歐洲在三千年內已更換過三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原始公社制度，奴隸制度，封建制度；而在歐洲東部，即在蘇聯，甚至更換了四種社會制度。可是，在這同一時期內，歐洲境內的地理條件不是完全沒有變更，便是變更得很少很少，甚至地理學也不肯提到它。而這是不言而喻的。地理環境方面一種稍許嚴重的變更都需要幾百萬年，而人們社會制度中甚至最嚴重的變更，也只需要幾百年或一兩千年就夠了。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地理環境決不能成爲社會發展底主要原因，決定原因，因爲在數萬年間幾乎仍舊不變的現象，決不能成爲那在幾百年間就發生根本變更的現象發展的主要原因。

其次，人口底增長，居民密度底高低，當然也包含在「社會物質生活條

件」這一概念中，因為人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中的必要成分，沒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便不能有任何社會物質生活。人口底增長是不是決定人們社會制度性質的主要力量呢？

歷史唯物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也是否定的。

人口底增長當然能影響到社會底發展，促進或延緩社會底發展，但它不能成為社會發展中的主要力量，它對於社會發展的影響不能是決定的影響，因為人口底增長並不能給我們說明為什麼某個社會制度恰巧要由一定的新制度來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一個制度來替代；為什麼原始公社制度恰巧是由奴隸制度所替代，奴隸制度恰巧是由封建制度所替代，封建制度恰巧是由資產階級制度所替代，而不是由其他某一制度所替代。

如果人口底增長是社會發展中的決定力量，那末較高的人口密度就必定會產生出相當於它的較高形式的社會制度。可是，事實上却沒有這樣的情形。中國人口密度比美國高至四倍，但美國在社會發展程度上高於中國，因

爲中國仍然是半封建制度佔統治，而美國却早已達到資本主義發展底最高階段。比利時人口密度比美國高至十九倍，比蘇聯高至二十六倍，但美國在社會發展程度上高於比利時，而蘇聯比之比利時，更是高出一整個歷史時代，因爲比利時還是資本主義制度佔統治，而蘇聯却已消滅了資本主義並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人口底增長不是、而且不能是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面貌的主要力量。

(甲)既然如此，那末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體系中，究竟什麼是決定社會面貌，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由這一制度發展爲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呢？

這樣的力量，據歷史唯物主義看來，便是人們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資料謀得方式，便是社會生活和發展所必需的食品、衣服、靴鞋、住房、燃料和生產工具等物質資料生產方式。

爲要生活，就需要有食品、衣服、靴鞋、住房和燃料等等，爲要有這些物質資料，就必需生產它們，而爲要生產它們，就需要有人們所利用來生產食品、衣服、靴鞋、住房和燃料等等的種種生產工具，就需要善於生產這些工具，就需要善於使用這些工具。

生產物質資料時所使用的生產工具，以及因有相當生產經驗和勞動技能而發動着生產工具並實現着物質資料生產的人，——這些要素總合起來，便構成爲社會底生產力。

但生產力還只是生產底一方面，生產方式底一方面，其所表示的是人們對於他們所利用來生產物質資料的物件和自然界力量間的關係。生產底另一方面，生產方式底另一方面，便是人們彼此在生產過程中發生的關係，即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和自然界鬥爭以及利用自然界來生產物質資料，並不是彼此孤立，彼此隔絕，各人單獨進行，而是以團體爲單位，以社會爲單位來共同進行的。因此，生產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是社會的生產。人們在

實現物質資料生產時，也就建立彼此間在生產內部的某種相互關係，即某種生產關係。這些關係可能是不受剝削的人們彼此間的合作和互助關係，可能是統治和服從的關係，最後，也可能是由一種生產關係形式過渡到另一種生產關係形式的過渡關係。可是，不管生產關係帶着怎樣的性質，而它們在什麼時候和在任何制度下，都如社會底生產力一樣是生產底必要原素。

馬克思說：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影響着自然界，而且彼此互相影響着。他們如果不用相當方式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生產。爲了實現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係，只有經過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係，才會有人們對於自然界的關係存在，才會有生產。」（「馬恩全集」，第五卷，第四二九頁）

所以，生產，生產方式是把社會底生產力和人們底生產關係兩者都包含在內，而體現着兩者在物質資料生產過程中的統一。

(乙)生產底第一個特點就是它永遠也不會長久停留在一點上，而是始終處在變更和發展狀態中，同時生產方式中的變更又必然引起全部社會制度，社會思想，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之變更，即引起全部社會的和政治的結構底改造。人們在各個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有着各個不同的生產方式，或者粗淺一點說，過着各種不同樣式的生活。在原始公社制度下有一種生產方式，在奴隸制度下有另一種生產方式，在封建制度下有第三種生產方式，餘此類推。同時，人們底社會制度，他們的精神生活，他們的觀點，他們的政治制度，也與此適應而各不相同。

社會底生產方式怎樣，社會本身在基本上也就會怎樣，社會底思想和理論，政治觀點和政治制度也就會怎樣。

或者粗淺一點說：人們底生活樣式怎樣，人們底思想樣式也就會怎樣。

這就是說，社會發展史首先便是生產發展史，數千百年來新陳代謝的生產方式發展史，生產力和人們生產關係發展史。

由此可見，社會發展史同時也就是物質資料生產者本身底歷史，即身為生產過程中基本力量並實現着社會生存所必需物質資料生產的那些勞動羣衆底歷史。

由此可見，歷史科學要想成爲真正的科學，便不能再把社會發展史歸結爲帝王將相底行動，歸結爲國家「侵略者」和「征服者」底行動，而是首先應當研究物質資料生產者底歷史，勞動羣衆底歷史，各國人民底歷史。

由此可見，研究社會歷史規律的關鍵，並不是要到人們底頭腦中，到社會底觀點和思想中去探求，而是要到社會在每個一定歷史時期所採取的生產方式中，即要到社會底經濟中去探求。

由此可見，歷史科學底首要任務是要研究和揭示生產底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底規律，社會經濟發展底規律。』（「聯共黨史」，一四九

——一五四頁）

中國舊歷史材料雖然很豐富，但大部是記載帝王與將相的行動，記載朝代興

亡的活動，而很少記載社會經濟的事實，這是研究中國歷史的一個大缺陷。

中國有些歷史家把自然界與人類社會對立起來，以爲人類社會的歷史只限於記載精神活動的結果。如梁啓超說：

『人類爲生存而活動，亦爲活動而生存。活動休止，則人道或幾乎息矣。凡活動，以能活動者爲體，以所活動者爲相。史也者，綜合彼等與活動者之種種體，與其活動所表現之種種相，而成一有結構的敘述者也。是故非活動的事項——例如天象、地形等，屬於自然界現象者，皆非史的範圍；反之，凡活動的事項——人類情感理智所產生者，皆活動之相，即皆史的範圍也。』（梁啓超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一頁）

把人類社會歷史不在致力於物質資料生產者——即勞動民衆的生產方式中去找尋，而在人類情感理智意識——即人類頭腦所產生的思想動作言行即所謂文化事功中去找尋，這種唯心論的觀點，根本就不能了解人類社會真正的歷史。

（丙）『生產底第二個特點就在生產底變更和發展始終是從生產力底變更

和發展上，首先是從生產工具底變更和發展上開始。所以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要素。起初是社會底生產力發生變更和發展起來，然後，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底經濟關係也依賴於這些變更並與這些變更相適應而發生變更。但這並不是說，生產關係不影響到生產力底發展，生產力不依賴於生產關係。生產關係雖然是依賴於生產力底發展而發展，但同時它們又反轉來影響到生產力，加速或延緩其發展。而且必須指出：生產關係不能過分長久落後於生產力底增長並和這一增長相矛盾，因為只有當生產關係適合於生產力底性質及狀況，並使生產力有發展餘地時，生產力才能儘量發展起來。因此，無論生產關係怎樣落後於生產力底發展，但它們遲早總應而且一定會去適合於生產力底發展水準，適合於生產力底性質。不然，便會有生產體系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統一底根本破壞，全部生產破裂，生產危機以及生產力破壞的情形。

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不適合的實例，它們兩者間衝突的實例，便是資

本主義國家中所發生的經濟危機，那裏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是和生產過程底公共性質是和生產力底性質極不適合的。這種不適合的結果，便是使生產力陷於破壞的經濟危機，而這種不適合的情況就是那負有使命破壞現存生產關係，並建立起適合於生產力性質底生產關係的社會革命底經濟基礎。

反之，生產關係和生產力性質完全適合的實例，便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這裏的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生產過程底公共性質是完全適合的，因此蘇聯沒有經濟危機，也沒有生產力破壞的情形。

所以，生產力不僅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要素，而且是生產發展過程中決定的要素。

生產力怎樣，生產關係也就應怎樣。

生產力底狀況所回答的是人們用怎樣的生產工具來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物質資料的問題，而生產關係底狀況所回答的則是生產資料（土地、森林、水流、礦源、原料、生產工具、生產建築物、交通聯絡工具等等）歸誰所有，

生產資料由誰支配——是由全社會支配，還是由單個的人，集團和階級支配並利用去剝削其他的人，集團和階級的問題。

以下便是從古代到今日的生產力發展的一般情景。由粗笨的石器過渡到弓箭，並與此相適應而由狩獵生活過渡到馴養動物和原始畜牧；由石器過渡到金屬工具（鐵斧，鐵口鋤等等），並與此相適應而過渡到種植植物，過渡到農業；金屬的製造工具繼續改良，過渡到冶鐵風箱，過渡到陶器生產，並與此相適應而有手工業的發展，手工業脫離農業的分立，獨立手工業生產以及後來手工業工場生產的發展；由手工業生產工具過渡到機器，手工業工場生產轉變為機器工業；再進而過渡到機器制。以及現代機器化工業的出現，——這就是人類史上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大致而遠不完備的情景。同時，生產工具底發展和改善當然是由參加生產的人們所實現，而不是與人們無關，所以，由於生產工具底變更和發展，人們，即生產力中最重要因素，也隨着變更和發展起來，他們的生產經驗，勞動技能以及運用生產工具

的本領，也隨着變更和發展起來。』（「聯共黨史」，一五四——一五六頁）中國有些歷史家，不了解人們的變化與發展，是伴着生產工具的變化與發展而來，科學與技能的發展是伴着生產經驗的發展而發展，反而以天命論，唯心論的觀點說：『天亶聰明。』『作之君，作之師。』把社會進化的動力歸之於少數聖賢。並且如孟子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曾使剝削制度合理化而離社會發展的真理更遠了。

『隨着社會生產力在歷史上變更和發展，於是人們底生產關係，人們底經濟關係，也與此適應而變更和發展。』

歷史上有五種基本生產關係：原始公社制的，奴隸制的，封建制的，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

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這在基本上是與當時的生產力性質相合的。石器以及後來出現的弓箭，使人絕對不能單身和自然界勢力及猛獸作鬥爭。人們當時爲要在森林中採集果實，在水裏

捕獲魚類，建築某種住所，便不得不共同工作，否則便會餓死，便會成爲猛獸或隣近部落底犧牲品。公共的勞動也就引起了生產資料和生產品的公有制。這裏還不知道什麼是生產資料私有制，而不過有些同時用以防禦猛獸的生產工具是歸個人所有。這裏並沒有什麼剝削，也沒有什麼階級。

在奴隸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是奴隸主佔有生產資料和佔有生產工作者，這生產工作者便是奴隸主所能當作牲畜來買賣屠殺的奴隸。這樣的生產關係在基本上是與當時的生產力狀況相合的。此時人們所擁有的已經不是石器，而是金屬工具；此時所有的已不是那種不知畜牧業爲何物，也不知農業爲何物的貧乏原始的狩獵經濟，而是已經出現了的畜牧業，農業，手工業以及這些生產部門彼此間的分工；此時已有可能在各個人間和各部落間交換生產品，已有可能把財富積累在少數人手中，而且真正把生產資料積累於少數人手中，已有可能迫使大多數人服從少數人並把這大多數人變爲奴隸。這裏已不是社會中一切成員在生產過程中共同地和自由地勞動，而是由那些被不

勞而獲的奴隸主所剝削的奴隸們底強迫勞動佔主要地位。因此也就沒有了生產資料和生產品的公有制。它已被私有制所代替了。這裏，奴隸主是第一個和基本的十足的私有主。

富人和窮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享有完全權利的人和毫無權利的人，他們彼此間的殘酷階級鬥爭，——這就是奴隸制度的情景。

在封建制度下，生產關係的基礎是封建主佔有生產資料和不完全佔有生產工作者，這生產工作者便是封建主雖已不能屠殺，但仍可以買賣的農奴。當時除封建所有制外，還存在有農民和手工業者以本身勞動為基礎佔有生產工具和自己私有經濟的個人所有制。這樣的生產關係在基本上是與當時的生產力狀況相合的。溶鐵和製鐵工作更進一步的改善；鐵犁和織布車的散佈；農業，園圃業，釀酒業和製油業的繼續發展；與手工業作坊並存的手工業工場企業的出現。——這就是當時生產力狀況底特徵。

新的生產力所需要的是在生產中能表現某種自動性，願意勞動，對勞動

感覺興趣的生產者。因此，封建主就把奴隸拋棄，因為奴隸是對勞動不感興趣和完全沒有自動性的工作者；而寧願利用農奴，因為農奴有自己的經濟，有自己的生產工具，具有為耕種土地並從自己收成中拿出一部分實物繳給封建主所必需的某種勞動興趣。

私有制在這裏已經繼續發展了。剝削幾乎仍如奴隸制度下的剝削一樣殘酷，不過是稍許減輕一些罷了。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的階級鬥爭，便是封建制度底基本特徵。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底基礎是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同時這裏已經沒有了私自佔有生產工作者的情形，這時生產工作者即僱傭工人，是資本家既不能屠殺，也不能出賣的，因為僱傭工人已免除了人格上的依賴，但他們却沒有生產資料，所以他們為要不致餓死，便不得不出賣自己的勞動力給資本家，並忍受繁重的剝削。除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外，還存在有免除了農奴制依賴的農民和手工業者以本身勞動為基礎佔有生產資

料的私有制，而且這種私有制在第一個時期是很流行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場企業已由機器化的大工廠所代替了。用農民粗笨生產工具耕作的貴族地產，已由根據農藝學經營和使用農業機器的資本主義大農場所代替了。

新的生產力所需要的是比閉塞無知的農奴們文化些，伶俐些，能够懂得機器並正確使用機器的生產工作者。因此，資本家寧願利用免除了農奴制羈絆而有相當文化程度來正確使用機器的僱傭工人。

可是，資本主義把生產力發展到巨大規模的時候，便陷入它自己所不能解決的矛盾中。資本主義生產出日益增多的商品並減低着商品價格，便使競爭尖銳化，使大批小私有主和中等私有主陷於破產，把他們變成無產者，減低他們的購買力，因而就使生產出來的商品無法銷售出去。資本主義擴大生產並把千百萬工人集合在大工廠內，便使生產過程具有了公共的性質，因而破壞了自己本身的基礎，因為生產過程底公共性質要求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而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却仍然是資本主義私人性的，即與生產過程底公共

性質勢不兩立的所有制。

生產力性質與生產關係間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是暴露於週期的生產過剩危機中，此時資本家因他本身使廣大民衆遭受破產而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者，便不得不燒燬生產品，消滅已製成的商品，停止生產，破壞生產力；此時千百萬民衆被迫失業挨餓，而這並不是由於商品不夠，却是因爲商品出產太多。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不復與社會生產力狀況相適合，而是已與社會生產力處於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

這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制度裏成熟着革命，其使命就是要用社會主義的生產資料所有制來代替現存的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的所有制。

這就是說，剝削者和被剝削者間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乃是資本主義制度底基本特徵。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此刻還只實現於蘇聯的這個制度下生產資料的公

有制是生產關係底基礎。這裏已沒有什麼剝削者，也沒有什麼被剝削者。生產出來的物品是根據「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來按勞動分配的。這裏生產過程中人們相互關係底特徵，乃是不受剝削的工作者們間同志的合作和社會主義的互助。這裏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狀況完全相合，因為生產過程底公共性質是由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所鞏固的。

因此，蘇聯的社會主義生產也就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週期的生產過剩危機，以及與此危機相聯結的荒謬現象。

因此，生產力在這裏是加速發展着，因為適合於生產力的生產關係使生產力有這樣發展的充分廣闊的餘地。

這就是人類史上人們生產關係發展的情景。

這就是生產關係發展對於社會生產力發展，首先是對於生產工具發展的依賴性，而因為有這種依賴性，所以生產力底變更和發展遲早要引起生產關係與此相適應的變更和發展。

馬克思說：

「勞動資料*的使用和創造，雖其萌芽形式已為某幾種動物所固有。畢竟是人類勞動過程所獨具的特徵，所以佛蘭格林說人類是製造工具的動物。勞動資料的遺骸對於研究已經消亡的諸社會經濟形態，也如動物骨骼底遺骸結構對於研究已消亡的諸種動物底軀體組織一樣，有極重要的意義。各個經濟時代所由以區別的不是生產什麼，而是怎樣生產……。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底尺度，而且是勞動在其中實現的社會關係底指標。」（馬克思之「資本論」，第一卷，第一二二頁，一九三五年版）其次：

（1）「社會關係是和生產力密切聯結的。人們既獲得新的生產力，便會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而隨着生產方式底改變，即本身生活保

*馬克思所說的「勞動資料」，主要是指生產工具而言。——「蘇聯共產黨（布）」

歷史簡要讀本」編者註

證方式底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所有一切社會關係。手力的磨坊產生了以封建主爲首的社會；蒸汽力的磨坊產生了以工業資本家爲首的社會。」（「馬恩全集」，第五卷，第三六四頁）

（2）「生產力增長底運動，社會關係底破壞以及思想底產生都是毫不間斷地發生着，不動的只是運動底抽象。」（同上，第三六四頁）

恩格斯在解釋「共產黨宣言」內所表述的歷史唯物主義時說道：

「每一歷史時代底經濟生產以及必然從它發生的社會結構，便是這時代的政治和思想歷史底基礎……。與此相適應的，是——自從原始公社的土地佔有制瓦解時起——全部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即社會發展各階段上被剝削階級與剝削階級，被支配階級與統治階級間鬥爭的歷史……。在這個鬥爭現今所達到了的階段上，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爲要擺脫掉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已非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以及階級鬥爭不可了……。」（恩格斯

爲『宣言』德文版所作的序言)

(丁)生產底第三個特點就在新的生產力以及與其相適合的生產關係產生的過程，並不是離開舊制度而單獨發生，不是在舊制度消滅以後發生，而是在舊制度內部發生；不是由於人們有意自覺活動底結果，而是自發地，不自覺地，不依人們意志爲轉移地發生的。其所以是自發的和依人們意志爲轉移地發生，是由於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人們不能自由選定這種或那種生產方式，因爲每一新輩人開始生活時，他們已遇到現成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即前輩人所工作的結果，因此這新輩人在最初一個時候，應當接受他們在生產方面所遇到的一切現成東西，應當去適應這些東西，以便有可能生產物質資料。

第二個原因，就是人們在改善這種或那種生產工具，這種或那種生產力要素時，不會覺悟到，不會瞭解到，也不會想到這些改善將會引起怎樣一種社會結果，而只是想到自己的日常利益，只是想要減輕自己的勞動，謀得某

種直接的、可以感觸到的益處。

當原始公社社會中某些社員逐漸地摸索式地由石器過渡到鐵製工具時，他們當然不知道，當然沒有想到這種革新會引起怎樣一種社會結果；他們並沒有瞭解到，沒有意識到，由石器過渡到金屬工具是意味着生產中的變革，結果一定會引起奴隸制度，——當時他們只是想要減輕自己的勞動和謀得眼前的感覺得到的益處，——他們當時的自覺活動只局限於這種日常個人利益的狹隘範圍。

當歐洲年輕資產階級在封建制度時期開始建造巨大手工工場企業，以與細小行業作坊並列，因而推進社會生產力時，它當然不知道，當然沒有想到它這種革新辦法會引起怎樣一種社會結果，它並沒有意識到，沒有瞭解到，這種「細微的」革新辦法會引起社會力量的重新配合，結果會發生一個要把它當時所十分感戴的王室政權以及它的優秀代表所往往夢想側身其間的貴族都一概推翻的革命，——當時它只是想要減低商品生產成本費，更多拿些商

品到亞洲市場以及剛才發現的美洲市場去銷售，藉以獲得更多的利潤，——它當時的自覺活動只局限於這種日常實踐的狹隘範圍。

當俄國資本家和外國資本家一起加緊在俄國培植現代機器化大工業，絲毫不觸動沙皇制度，而聽憑地主們牽制農民時，他們當然不知道，當然沒有想到生產力這種嚴重的增長會引起怎樣一種社會結果；他們並沒有意識到，沒有瞭解到，這個在社會生產力方面發生的嚴重躍進會引起社會力量的重新配合，結果會使無產階級能和農民聯合起來實現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當時他們只是想要極端擴大工業生產，掌握巨大的國內市場，變成壟斷家並從國民經濟中吸取更多的利潤，——他們當時的自覺活動並沒有超出他們日常的狹隘實踐的利益。」（同上，一五六——一六二頁）

當國際帝國主義加緊剝削中國的時候，不得不在中國建築鐵路，開闢某些礦山，建立某些現代的機器工廠，以及建立工業和商業的中心，而同時他們要維持滿清的和封建軍閥的專制制度以便榨取中國農民的血汗，當然，在起初的時候，

帝國主義的資本家他們沒有知道和沒有想到這些企業會引起什麼社會的結果，他們沒有意識到和沒有了解到在社會生產力部門中這些企業會引導中國無產階級的出現，中國知識界的進步，民族覺悟的勃興，解放運動的加緊等等的社會力量的重新結合，這重新結合給了無產階級以可能去和農民聯合起來完成民族與民主的革命戰爭，擔負世界革命一部分的偉大任務。帝國主義的資本家們簡單地想極度的榨取額外利潤，擴大賤價勞動的機器生產，榨取巨大的中國市場。他們的自覺的活動沒有走出他們日常的狹隘的實際利益的範圍之外。

「因此馬克思說：

「人們在自己生活底社會生產中（即是在生產爲人們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中。——編者註）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爲轉移的關係即與他們當時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程度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二六九頁。）

* 着重點是「聯共黨史」編者所加。

但這並不是說，生產關係底變更以及由舊生產關係到新生產關係的過渡是一帆風順地進行，而不經過什麼衝突，不經過什麼震動，恰巧相反，這樣的過渡通常是表現於用革命手段來推翻舊生產關係而奠定新生產關係。到一定時期為止，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生產關係方面的變更，是不依人們意志為轉移而自發進行的。但這只是到一定時候為止，只是到已經產生和正在發展的生產力還沒有充分成熟的時候為止。而當新生產力已經成熟時，現存的生產關係及其體現者的統治階級就變成了「不可克服的」，只有經過新階級自覺活動，只有經過新階級強力行動只有經過革命才可掃除的障礙。這裏特別明顯地表現出應該用強力把舊生產關係消滅掉的那些新社會思想，新政治制度和新政權底偉大作用。在新生產力與舊生產關係互相衝突的基礎上，在社會底新經濟需要的基礎上產生出新的社會思想；新的思想組織和動員羣衆；羣衆團結成爲新的政治軍隊，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權，並運用這個政權去用強力消滅生產關係方面的舊秩序而奠定新秩序。於是，自發的發展過程就讓位於

人們自覺的活動，和平的發展就讓位於強力的變革，進化就讓位於革命。

馬克思說：

『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一定團結成爲階級……它藉實現革命而把自己變爲統治階級，並以統治階級資格去用強力消滅舊的生產關係。』(『共產黨宣言』，一九三八年版，第五二頁)

其次：

(1) 「無產階級運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奪取資產階級所有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於國家手裏，集中於已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儘量迅速地增加全部生產力。」(同上，第五〇頁)

(2) 「強力是每一個舊社會在懷孕着新社會時的產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六〇三頁，一九三五年版)

以下便是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爲他那部名著，「政治經濟學批評」所寫的有

歷史意義的「序言」中，對歷史唯物主義底實質所作的一個天才的表述：

「人們在自己生活底社會生產中彼此間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他們本身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與他們當時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程度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底總和就組成爲社會底經濟結構，即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物所藉以樹立起來，而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其相應的那個現實基礎。物質生活底生產方式決定着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過程。並不是人們底意識決定人們底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們底社會存在決定人們底意識。社會底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便和它們向來在其中發展的那些現存生產關係，或不過是現存生產關係在法律上的表現的財產關係發生矛盾。於是這些關係便由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了束縛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時代就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更，於是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物中也就會或遲或速地發生變革。在考察這些變革時，必須時刻把經濟生產條件方面所發生的那些可用自然科學精確眼光指明出來的物質變革，

去與人們所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或哲學的形式，——簡言之，思想形式，——分別清楚。正如我們評判一個人時不能以他對於自己的揣度為根據一樣，我們評判這樣一個變革時代時也不能以它的意識為根據。恰巧相反，這個意識正須從物質生活底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現存的衝突中求得解釋，無論那一個社會形態，當它所給以充分發展餘地的一切生產力還沒有展開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當它所藉以存在的那些物質條件還沒有在舊社會胞胎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只會抱定自己所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我們仔細去看時總可看出，任務本身，只有當它所能藉以得到解決的那些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是已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發生的。」（『馬克思選集』，第一卷，第二六九至二七〇頁）（同上，一六三——一六五頁）

這就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這就是馬克思給我們研究歷史的方法。

三 研究中國歷史應選擇的材料

中國在有確實的文字史料以前——也就是在有信史以前，還有一個很長的神話式傳說時期，因此研究中國歷史的史料可以分爲兩部分。

第一部分史前時期神話傳說式記載的材料：

章學誠說：『六經皆史』。除了六經以外，現在我們還有許多古書，但是這些書有很多極不可靠，而他們記載中國歷史的起源，又很不一致，尙書則開始於唐虞，竹書紀年起於夏，史記則開始於黃帝。還有許多盤古開天闢地以及三皇五帝等等說法，但是這些都是靠不住的，因爲根據最近考古學的智識所得的結果，中國出土的古物只出到商代，而商代還是金石並用的時代，文字方在產生的過程，生產工具和農業還屬幼稚，還沒有發現鐵器的證明。因此，我們從商代起才算中國有真正的歷史，商代以前底古書記載只能看作神話傳說式的記載。

我們有什麼把握來斷定某些傳說是真的，某些傳說是假的呢？我們只有一面盡量利用龜甲文，葬器及現在新出土的新石器和金（青銅）石並用等等有限的實物；一面還要用馬克思的史的唯物辯證法來作我們解剖史前時期人類社會的唯一武器。馬克思雖然沒有論古代社會的專書，恩格斯却根據摩爾根數十年實地研究的結果，寫成『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一部偉大的著作。恩格斯在本書的原序上說：『本書含有幾分完成遺志的意義。除卡爾、馬克思外，沒有一人能够發揚光大摩爾根（Lewiz. H. Morgan）所研究的結果而與自己的唯物史觀連繫起來。馬克思很想藉此闡明這觀念的全部意義。因摩爾根在美洲又單獨發現馬克思已於四十年前所首創的唯物史觀。他於半開化和文明兩代的比較中，大體上得到和馬克思相同的結論。』因此，我們可以把摩爾根研究所得的結論，看作是合乎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

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法則是一元的，都有他的一般性，共同性。因此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當然也不能在這個共同法則之外另有一條道路。

我們就以這兩方面來判斷古書記載古代社會的真偽。
根據摩爾根古代社會的研究，史前時期社會進化的階段可以排列如下表：

恩格斯——摩爾根對史前時期社會進化階段的劃分。

蒙昧時代

中 期	初 期
1. 用火。 2. 捕魚。 3. 完全不受氣候和地勢的限制。 4. 石器之使用。 5. 偶然知道打獵。有食人之風。	1. 從猿轉到人。 2. 能直立而手發展為勞動工具。 3. 採集、巢居。 4. 語言的形成。 5. 開始知道火，但還不能用。

雜交時代——羣居

史前時期社會進化階段

野蠻時代

期 末				期 中			期 初			期 末			
1. 發明弓箭工具。頭腦的發達。	2. 漁獵爲主。	3. 新石器器的使用。食料生產的支配。	4. 以木料作器具。食料生產的支配。	5. 以樹皮蘆葦編成籃子及織物。	6. 刻木爲舟，用木料造房屋。	1. 陶土術的發明。	2. 1. 開始有定居的村落。	3. 2. 1. 西半球種植發展。有灌溉的田圃，	1. 東半球牧畜發展，馴養供給乳及肉	2. 畜爲主，後成人類主要食品。	3. 發明石塊及土磚建築房屋。	4. 發明銅器（生產工具）。	5. 食人之風漸消滅。
1. 鐵的發明（用作鑄鐵）農業進步。	2. 手工業漸發達，車船與精巧建築術	3. 藝術發展，城墟市鎮與精巧建築術	4. 文字的發明，與由於它的文獻記錄	1. 開始的發明，與由於它的文獻記錄	2. 只利用而移於文明時代。這一階段	3. 步，在東半球獨立完成。其生產之進	4. 豐富。						

由對偶婚至固

由血族羣婚至

男性氏族社會

女性氏族社會

農村公社
國家的形成
——
男性中心

——
女性中心

附註：恩格斯在『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中將摩爾根的分類節約如下：

蒙昧——以獲得現成的自然生產物爲主的時代，人類之技術生產物大概是幫助這種獲得的工具。

野蠻——獲得畜牧及耕作的知識，以及學習由人類的活動以增加天產物生產力的新方法
方法的時代。

文明——習得天產物的更廣大的利用，從事製造及藝術之時代，

第二部分自有成文史以來比較可靠的歷史記載的材料。

自商代以來，特別是秦漢以後，中國的史書真是汗牛充棟。但是記載朝代興亡和帝王將相個人活動的多，而關於社會生活，尤其是關於社會經濟生產等等最重要的事實，反特別的少，這就需要我們能細心地在各方面去搜尋。土地農民問題是中國歷史中最基本的問題。如果我們隨處注意，也有不少的材料足供我們研究。如生產工具方面：

易經繫辭下傳中有：

『斲木爲耜（鋤），揉木爲耒（鍤）。』

詩經中有：

『命我衆人，庠（準備）乃錢（鋤類）鎛（鍤類）奄觀銍（鎌）芟』

孟子書中有：

『負耜耒而自宋之滕』。『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斧斤以時入山

林』。『深耕易耨』。等等。

國語中有：

『美金（銅）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鐵）以鑄鉏（犁）夷（鋤類

用以除草）斤（似鋤而小者）掘（鉏的一種掘起土的）試諸土壤。』（齊

語）等等。

生產關係方面：

漢初董仲舒說：

『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

佰，貧者亡立錫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墾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輸本田主也。）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師古曰，名田占田也。）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漢書」，卷二十四上，「食貨志」第四上）

這些都能使我們知道當時生產工具和生產關係的概要。

中國封建社會基本的生產方法是小農業與家庭工業合成一體。這就使自給自足的經濟根深蒂固而鞏固了氏族社會殘餘的家族制度。由這個社會經濟基礎，形成了以孝爲本的倫常道德的社會思想和理論，又由這個思想和理論的反響來鞏固家族制度。這種小農業與家庭工業合爲一體正是中國所謂古聖賢所企求的。如孟子描寫最好的農村生活說。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

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載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章上）

中國在二千多年前所謂春秋戰國孔子孟子所處的時代，商業已有很大的發展，小農業與家庭工業合一的自足經濟應該在瓦解的過程。所以孔孟當時力倡王道以謀復古，以抽象的仁義來反對功利，沒有人去贊成他們，他們的力量也不能倒挽歷史前進的車輪，徒歎王道之不行，這只是表示他們的不識時宜。爲什麼中國的商業資本不能向前發展呢？一方面由于小農業與家庭工業合一的不易破壞；另一方面由於商業資本之積累以高利貸資本的形式流入農村（秦使民得買賣土地）未能向大工業上去發展，這就使中國停滯在封建社會的階段以至於現代的一個主要原因。

馬克思說：

『資本主義以前的，氏族的生產方法，其內部的穩固和結構，使商業所具有的破壞力受到阻礙，這種阻礙在英國人同印度及中國的來往關係上表現

得十分顯明。在中國和印度，生產方法底廣大基礎就是小農業與家庭工業合成一體，而且在印度還有那種建立在土地村有制上面的農村公社底形式，這種形式過去在中國也是一種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國人以統治者和地租佔有著底資格，立刻就使用了自己直接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勢力，以破壞這些小模範經濟的村社。在這裏，他們以廉價商品來消滅紡紗業和織布業，消滅這種工業合一所形成的歷來就有的組成部分，並這樣來破壞農村公社，只是在這個意思上講來，他們對於生產方法才有革命化的影響。可是就在這裏，他們的這種破壞影響也只是很慢地才收到成效。他們這種破壞影響在中國所得的成效更少，因為中國本國的政權不來幫忙。在中國農業與手工工場業直接結合。這就大大節省錢財又節省時間，因此就給大工業生產品以最頑強的抵抗，因為大工業生產品的價格，是包括着這些生產品底流通過程中處處所耗去的不生產的費用。』（「資本論」，俄文版第三卷，第一部第二九九頁）

馬克思又說：

『原始時代的工作人與生產工具和資料的一體（這裏姑且不講奴隸制度下的關係，在奴隸制度之下，工作人本身就是勞動底客觀條件之一）有兩個主要形式：亞洲的農村公社（原始共產主義）以及各式各樣的小規模的氏族的農業（家庭工業與此種農業相結合。）這兩種形式都是原始的形式，都同樣不能用來把勞動作為社會勞動來發展，且不能用來發展社會勞動底生產率。』（馬克思著：「剩餘價值論」，俄文版第三卷，三〇八頁）

由此可見中國小規模的氏族的農業，即家庭工業與此種農業相結合的農業形式，是原始氏族社會底殘餘。他們有堅強的閉關自守性，無論其怎樣純良，他們始終是東方專制政體底穩固基礎，他們使人的理智拘泥于最狹隘的範圍內。把理智變成迷信底馴服工具，使他服從傳統慣例，使它不發生什麼影響，使它不能努力于歷史上的活動。它雖然也經過家庭奴隸的使用和封建的關係，由奴隸制轉化為農奴制，但他沒有能够藉奴隸勞動來加強並發展生產，開始經濟生產道路上的第一步。

四 中國歷史的範圍

我們講中國歷史應該是包括全中國各民族的歷史，而事實上，所有的舊歷史材料和歷來的習慣，都以漢族的歷史爲中國的歷史，蒙滿各族如遼、金、元、清雖有部分的歷史，而都只記載其皇室或與漢族有關的事實，並且存在着許多民族歧視的偏見。至於回、藏、苗、僛、番、蠻、夷、黎各族的歷史，幾乎完全沒有。現在我們應該把各民族的歷史，合起來作成中國的歷史。雖然材料很少，事實上有許多困難，但是，我們要照這個目的作去。

五 中國歷史的編年紀事和時代的劃分

中國近年出了一些用新方法來著述的中國歷史書籍和譯出了一些這類書籍，其中有不少的良好作品。但是，大多數注重在社會發展形式的敘述與辯論，而把中國舊歷史編年紀事的例子完全拋棄，這樣就只能算是中國社會形式發展史。

我們認為：歷史課程，應當在年代的聯繫性中，敘述最重要的事變和事實及歷史人物的評價。不能把社會經濟形態底抽象的定義給學者，拿抽象的社會學的公式代替有聯繫性的敘述公民史。因為歷史的必須有年代，猶如地理的必須有經緯線一樣，使人一見編年，即能知道其事在時間上的時置，方有用處。中國舊史學家章太炎亦感覺到這一點。他說：

『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國史之有編年宜自此始。故太史公錄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

和，明前此無編年書。」（章氏叢書，國故論衡中「原經」六八頁）他又說：

「春秋所以獨貴者，自仲尼以上，尙書則闕略無年次，百國春秋之志，復散亂不循凡例……令仲尼不次春秋，今雖欲觀定哀之世，求五伯之迹，尙荒忽如草昧。夫發金匱之藏，被之萌庶，令人不忘前王，自仲尼左丘明始。」（同上）他又贊美春秋說：

「經傳相依，年事相繫，故爲百世史官宗主。」（章氏叢書，檢論「春秋故言」二二頁）

自司馬遷作史記改編年爲傳記，中國所謂二十四史多循其例，凡一人一事可于此具見其首尾，雖有一節之長，而於歷史整個時間的聯繫上則不免隔闕，故司馬光作資治通鑑，依左氏傳體爲編年，以繼春秋左傳編年之例，上起戰國，下終五代，然後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繁事，如指諸掌。此後仿其例而繼續成

通鑑者很多，于此可見編年的可貴。因此，我們必須根據中國舊史編年紀事的材料來敘述中國歷史。自然這不是機械地，死板地按年敘述，而是於相當必要時附以紀年。紀年以民國紀元與西歷紀元並用。

關於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我們中國歷史家會有許多爭論，尙無定議，爲了更合于科學，更妥當的處理這一問題，爭論是可以而且是必要的。現在提出我個人的意見以供研究歷史的同志們商討，我想把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事變分爲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代史四大時期。

一、上古史——從太古到周朝末年秦統一天下止（民國紀元前二二三二年即公元前二二一年。）這中間又分爲兩個時期：

- 1 從太古到夏朝末。這是神話傳說的時期；
- 2 從商朝到秦統一天下，這是一方面有出土物，一方面有比較可靠的文字記載的時期。

二、中古史——自秦統一天下到五代末年宋平定天下止。

民國紀元前二一三二年到九五三年
公元前二二一年到公元九五九年

三、近古史——自宋平定天下到鴉片戰爭止。

民國紀元前九五三年到七十二
公元九五九年到一八四〇年

四、近代史——近代史又分爲兩個時期。

1 自鴉片戰爭到『五四』（一九一九年）運動。總稱爲舊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民國紀元前七二年到民國八年
公元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九年

2 自『五四』運動到現在。總稱爲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民國八年到現在
公元一九一九年到現在